



馮 超

保定軍校的學生，在歷史舞台的表現，各具風姿。這一群體是民國史的建樹者，通過對這一群體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民國初期的軍事教育特色以及軍人學生這一特殊群體在當時社會中的種種作為，以此來放映民國初期社會狀況、軍人學生的思想認識水準，以及軍人學生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進而可以審視這一群體的社會影響力。民國時期的戰爭頻繁，軍人學生帶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社會中的表現比較活躍，更易於我們對軍人學生的總體考察。

### 一 皖籍軍人學生的發展歷程

皖籍軍人群體本源於1862年李鴻章招募組建的「淮軍」。淮軍有濃厚的鄉土特色，大量士兵從皖北招募，將領主要是皖人，佔64%。<sup>1</sup>洋務運動時期，清廷開始發展近代軍事工業，並建設了新型的陸海軍。李鴻章為培養陸軍軍官，接受淮軍將領周盛波、周盛傳的建議，於1886年建成「天津武備學堂」，學堂的學生皆由各地將領推薦，其中正定鎮葉志超、通永鎮吳育仁、皖南鎮史宏祖等各挑精悍靈敏弁兵入學堂，最早皖籍軍人學生始於此。同年，李鴻章派楊宗廉為天津武備學堂首任總理，而楊久任淮軍統領及李鴻章幕府，「學生來源也大多為淮軍弁兵，所以顯示出有深厚的淮系存在」，<sup>2</sup>以致有人認為該學堂是「淮軍集團的軍事教育機構」。<sup>3</sup>武備學堂後經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而毀。李鴻章創辦學堂為改造淮軍，雖成效有限，因為學堂畢業生回營後並無指揮軍隊之權，各營老將視之不理，僅僅充當軍營教習而已，<sup>4</sup>但卻為皖籍軍人群體的形成準備了條件。學堂畢業生皖籍的有段祺瑞（合肥）、趙理泰（合肥）、段芝貴（合肥）、雷震春（宿州），是為軍校皖籍學生的早期人物。

甲午戰敗，北洋陸海軍受到重創，清政府重建新式陸軍，定名為「新建陸軍」，初由胡燏棻督練，後袁世凱接替。新建陸軍中有皖籍將領左翼翼長淮軍舊將姜桂題（亳州）、炮兵二營統帶段祺瑞（合肥）、步兵二營統帶吳長純（廬江）、參謀營務處監督汪朝宗（旌德）；右翼翼長淮軍舊將龔友元（合肥）、隊官雷振春（宿州）以及袁世凱參謀阮忠樞（合肥）。1905年北洋六鎮編成，皖籍軍人佔相當的數量。袁任職後，另設行營武備學堂，任用大量北洋武備學堂學生，以段祺瑞為炮科學堂總辦，皖籍軍人學生開始受到重用。李鴻章死後，袁世凱地位上升，接替李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淮軍將領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後皖籍派軍人以受袁世凱重用的段祺瑞為中心。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六日（1902年6月21日）袁建議設直隸軍政司，袁世凱兼任督辦，下設三處，陸軍兵備處、陸軍教練處、陸軍參謀處，段祺瑞為陸軍參謀處總辦。另外為培養北洋軍各級軍官，袁又開設北洋行營將弁學堂，該學堂總辦為雷振春。此外，參謀處總辦段祺瑞兼任參謀學堂、測繪學堂總辦。皖籍軍人的社會地位

不斷提高。

光緒二十九年 月 三日（1903年12月1日）清廷設練兵處統管全國練兵事宜，下設軍政司、軍令司、軍學司，段祺瑞為軍令司正使。此後清廷開始大規模開辦軍事學堂，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設立，隸屬軍政司，該學堂是繼天津武備學堂後的一所大型軍事學堂。學堂有安徽籍教習吳紉禮（合肥）、劉愧森（合肥）以及張志紳（壽縣），佔教習人數12%。「這種教職員的分佈狀況，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學堂招生和學生的分配。」<sup>5</sup>皖籍學生佔相當的比例，僅僅次於直隸籍、京兆籍。從學堂步、馬、炮、工、輜五科來看，三期畢業生可考者計707人，直隸420人，佔59%，京兆區115人，佔16%，皖籍有69人，佔9.7%。<sup>6</sup>皖籍學生主要有汪壽祺（具體籍貫不可考）、姜佔元（亳縣）、姚任支（阜陽）、劉文明（合肥）、周孝述（合肥）、宋邦翰（合肥）、吳長善（廬江）、吳中英（合肥）、周樹民（宿州）、高世讀（亳縣）、趙協彰（宿縣），這些人中後來大多獲將軍銜。<sup>7</sup>

1906年11月6日，清廷成立陸軍部，將兵權收歸中央。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停辦，清廷新建通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亦稱陸軍速成學堂，屬陸軍部軍學司管轄，後與另一軍校保定軍官學堂合併。學堂管理人員有所變動，督辦仍為段祺瑞，總辦趙理泰（合肥），工科科長虞克棟（合肥），輜重科隊官趙協彰。教職員安徽有20人，佔9%。學堂共辦二期，其中皖籍學生為46人，著名的有9人：張國威（宣城）、倪道炯（阜陽）、王普（阜陽）、陳更（桐城）、查麟（懷甯）、汪宏（懷甯）、龔理灝（合肥）、虞克棟（合肥）、許高節（蒙城）、李應生（合肥，後留學於日本）。<sup>8</sup>

1906年，保定軍官學堂正式開辦，後隸屬軍諮府，分速成、深造兩科。軍官學堂的創辦是清廷陸軍學堂辦學方針的體現。由於軍官學堂為培養高級軍官，清廷一時難有合適學員，故先辦陸軍速成學堂，培養合適軍官，送入軍官學堂深造。可見，速成學堂是臨時性質的軍校，俟「正課學堂辦有成效，速成學堂即行停辦」。<sup>9</sup>1911年7月，軍官學堂更名為陸軍預備學堂。1912年，則正式更名為陸軍大學，遷到北京。軍官學堂共辦三期，共畢業228人，其中安徽籍有27人，僅次於直隸，佔11.8%。全部皖籍人員如下：一期人員有衛守鑒（合肥）、竇世芳（合肥）、陶雲鶴（合肥），張敬堯（霍邱），吳新田（合肥）、張慶泰（合肥）、方先聰（巢縣）、馬毓寶（蒙城），黃治紳（合肥）、胡叔麟（合肥）、張學言（蒙城）、江壽祺（潛山）；二期人員有吳中英（合肥）、夏文榮（合肥）、唐國漢（合肥）、張仲鼎（宿州）、姚任之（阜陽）、胡雲程（合肥）、馬興邦（天長）、張時仁（廬江）；三期人員有胡翊儒（桐城）、丁翰東（桐城）、徐嶽雲（望江）、魏旭初（桐城）、吳經禮（合肥）、許德懋（合肥）、胡之傑（太湖）。其中陶雲鶴（一期速成）、張敬堯（一期速成）、吳新田（一期速成）、馬毓寶（一期深造科）、黃治紳（一期深造科）、胡叔麟（一期深造科）、吳中英（二期）、夏文榮（二期）、姚任之（二期）較為出色。<sup>10</sup>

陸軍大學遷北京後，陸軍部決定在原址開辦陸軍軍官學校，民國元年（1912）正式開學，隸屬於陸軍部軍學司。這所軍校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保定軍校」。保定軍校共辦九期，至民國 一年（1922）12月停招正科生，後改為「軍官特別班」，民國二 三年（1924）正式停辦。期間，培養北洋初級軍官6500餘人，皖籍學生超過330人。<sup>11</sup>

通觀近代軍校的發展歷程，保定軍校是民國軍事教育的一個里程碑。不論從辦學品質、教員資質、學生素質以及學生數量上都有大的飛躍。在民國建立後一段的時間內，這些軍校畢業生在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民國初年不穩定性和動亂性的社會背景，正是軍人學生群體

發揮重要作用的條件。保定軍校創辦於民國建立之時，「吸收了清末各類軍事學堂和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軍事院校辦學經驗，是中國近代比較完善和正規化的軍事學校」。<sup>12</sup>軍校創辦後，培養的軍人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勢力。從保定軍校走出來的軍人學生群體，有不同的派別之分，其中的地域影響較大。保定軍校由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創辦，實際一直受到皖系軍閥的操縱和控制，軍校隸屬陸軍部軍學司管轄，而軍學司正是由皖系把持。其中皖籍將領趙理泰和賈德耀分別為兩任校長，趙是段祺瑞的親信，<sup>13</sup>賈「與段合肥的淵源較深」。<sup>14</sup>此外，皖系幹將曲同豐任一屆校長，而一任教育長趙協彰也係皖籍。從軍校的學生來源上看，皖籍學生在總人數中佔居相當的比例。綜上所說，以皖籍軍人學生為考察物件已有可取性和代表性，足以反映軍人學生的整體動態。

## 二 保定軍校皖籍學生的來源及入學原因

皖籍學生基本上來源於皖系策源地合肥、皖省城懷寧（安慶）以及皖省貧困地區三地域。皖省貧困地區的學生佔半數以上，這些地區相對比較落後，諸如皖南、皖西山區等。皖系策源地合肥籍的學生佔1/3以上，尤其在中後期合肥籍學生已明顯佔主導地位。懷甯籍的學生與合肥籍學生成相反的趨勢，在中後期人數已愈來愈少。保定軍校第五期與六期皖籍學生人數較多。這一時期正值段祺瑞執政時期，皖系急於擴充勢力，加強中央集權，控制地方。1916年9月段組閣後，廢除了袁氏所制的地方軍政長官稱號，在新任的地方軍政人員中，屬皖系的有：安徽省長倪嗣沖、山東督軍張懷芝、福建督軍李厚基、陝西督軍陳樹藩、甘肅督軍張廣建、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以及早期依附皖系的河南督軍趙倜、熱河都統姜桂題、奉天督軍張作霖等。皖系勢力覆蓋到陝、甘、魯、浙、閩、滬、皖南、皖中等地。在皖籍勢力大發展時期，軍校的皖籍學生也隨之增加。學校後期皖籍學生眾多，這時軍校所招學生基本為普通中學生，沒有正規軍校升學程式的限制，故人數普遍增多。

皖籍學生是保定軍校生源重要來源地，所佔比重相對全國來講，可為一觀。大量皖籍學生的參軍入學，有以下幾點原因：（1）皖系軍閥的照顧與影響。皖系長期控制著保定軍校，而且重用軍校學生。皖軍的主力邊防軍中，尤其是第一師上中級軍官「多是保定軍校的教職員」，「初級軍官多數是保定軍校剛畢業的學生」。<sup>15</sup>（2）安徽青年的生活貧困，以入軍校謀出路。自從科舉制度停止後，社會青年沒有出路，參軍入伍成為當下的重要生存途徑。皖省並非富庶之地，除蕪湖地區曾為通商口岸，經濟較為繁華外，其餘地區則較為落後，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不高，尤其是皖南和皖西山區更是貧困。當時報考軍校的待遇好，完全公費，按季發放制服，伙食豐富，每人每月有津貼光洋2元，「貧寒出身的同學平日節省，作為寒暑假回鄉省親的旅費，尚有裕餘」，<sup>16</sup>因此引起了很多貧窮子弟。（3）當時戰亂的社會環境，有利於青年選擇軍校，尤其是軍隊初級軍官不足，各派軍閥紛紛爭奪重用軍事人才。辛亥革命後，無論是孫中山短暫的臨時政府之下，還是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洗禮後，已經成為四分五裂的局面。各派別之間的權力爭奪不斷，社會難以完成實質上的和平統一。在經歷「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張勳復辟」、「南北戰爭」、「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等大小戰亂的社會背景下，社會青年參軍的熱情不減，儘管報考軍校的動機不盡相同。當時的社會條件營造出了一種參軍的客觀氛圍，甚至報考軍校一種客觀社會需要。曾任保定軍校的校長皖系幹將曲同豐時言：當時中國社會軍隊「軍官缺乏太甚，大總統頗汲汲注意於造就將材」。<sup>17</sup>這一言論確實為當時中國社會軍隊存在的不足之處，所以當時社會的初級軍官的培養迫在眉睫，已成為一種社會需要。社會青年紛紛報

考軍校，正體現了這一社會要求。（4）民國初年的軍事教育得到高度重視，不僅僅是軍閥的軍事統治要求，還有有識之士的救國創見。曾任陸軍總長的張紹曾對於軍事教育便有一番認識，他言：「今國勢之衰。亦云極矣。庶政叢脞，百業凋敝，推原其故何？莫非軍事上之凌亂龐雜，為之厲階。正其本而清其源，自非將軍事收束而整理之不為功。」<sup>18</sup>

通過對皖籍學生的來源和入學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軍人學生在社會演變過程中的發展態勢：他們聚集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引導力量，與當局團體存在緊密聯繫，這種聯繫成為他們與社會演變溝通的紐帶，而民國初期軍界人物對社會發展趨勢上的典型主導地位正是軍人學生力量的重要體現。藉此，筆者給與幾點說明：其一、皖籍學生的來源只是保定軍校學生一部分，分析這一群體的來源以及形成原因，旨在表明保定軍校的軍人學生群體存在的現實性和條件性，而並非強調皖籍學生的特殊性。其二、皖籍軍人學生包容在軍校軍人學生的整體中，雖不能完全代表整體，也不失為軍人學生整體動態表現的載體。其三、以皖籍軍人學生為考察對象，實際上是將皖籍學生置於整個軍人學生群體這一前提下進行的地域性考察，要旨在於分析軍人學生群體構成的社會基礎。下文將突破皖籍軍人學生的框架，從民國初期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之宏觀視野中，進一步探討軍人學生的社會影響力。

### 三 保定軍校軍人學生在民國初期的社會活動

軍人學生是民國社會的特殊群體，這一群體與當時社會存在著明顯的互動關係。軍人學生對社會的發展有一種群體認同的要求，這反映在軍人學生的社會觀念以及人生信念上，而社會的變化也會對軍人學生產生重要影響，這反映在軍人學生對社會變化所表現出來的社會行為方式上。以下便結合上述的互動關係，分析軍人學生群體在民國初期的社會活動。

#### 1 「二次革命」與軍人學生

辛亥革命後的皖省處於同盟會的革命勢力影響之下，時任安徽都督柏文蔚是同盟會員，一直跟隨孫中山，同袁氏政府採取對立的態度。袁世凱對皖督柏文蔚不為信任，不久柏即被解除職務。皖省的革命氛圍頗重，安徽革命黨人活動頻繁，柏被解職後，革命黨人管鵬、陳紫楓企圖暗殺袁任命的新都督孫多森，結果未成。<sup>19</sup>「二次革命」爆發後，皖省革命大黨實力較強，進而宣佈獨立。在革命氣氛的影響下，保定軍校的許多學生紛紛南下參加革命，其中皖籍學生有25人，佔據重要比例，這與皖省的革命精神是分不開的。軍校中很多學生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與柏文蔚等革命派保持了聯繫。<sup>20</sup>「二次革命」失敗後，這些學生都被開除學籍。軍人學生的革命熱情受革命黨思想影響較深，但作為社會變化的互動反映，軍人學生參加革命活動是必然的。在「二次革命」的背後，我們也可以看出，地方勢力與軍校學生之間的潛在聯繫。這裏皖省情況只是一個代表，江西、湖南、廣東、福建、四川等省都有學生南歸參加革命。作為軍人學生，參加軍事戰爭本身就有一種軍人職責因素的影響，所以在後來的直皖戰爭和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都有軍人學生的參加。分析這種內在的主觀因素，對於考察軍人學生與社會的互動聯繫也有積極意義。

#### 2 反日活動與軍人學生

1915年5月，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軍校學生的極大震動，學生舉行集體罷課，誓死反日到底，釀成學校不小風潮。軍人學生的愛國精神始終是軍人的本色，保定軍



校的學生憤於日本滅亡中國的企圖，面臨著亡國之痛，軍人的氣慨表現得淋漓盡致。儘管有軍紀的束縛，但也不能阻擋他們的愛國熱情。當時的校長曲同豐也頗為同情學生的愛國舉動，<sup>21</sup>罷課風潮持續很長時間才得以解決。當社會的反日氛圍形成後，每一群體都有一種迎合社會要求的使命感，軍人學生當然也不會例外。

### 3 帝制活動與軍人學生

當時軍校學生頗具軍人的品質：絕對服從命令，不參與政事。一般學生都能恪守這一軍紀。然而在袁氏帝制活動風波不斷的環境刺激下，學生並沒有墨守成規，而是紛起反對。「袁世凱的稱帝活動，遭到學生們的反對，許多學生紛紛離校，到南方參加革命。」<sup>22</sup>革命的精神、愛國的真知已早在軍校學生中種下了根基。民國時期的軍人學生再也不會是盲目忠於個人的懵然之輩，他們不少人有自己的信念，甚至把自己的命運和民族、國家的前途相聯繫了。如當時軍校學生張治中所言，「因默念祖國來日大難，恐雖欲報國而無由，不禁萌厭世之念焉」，「然予決不自任其咎也，蓋予平心徹思，非自吾本體而發也，實為外來之刺激力迫之使然耳」。<sup>23</sup>報國無門，有為青年頓生「厭世之念」，實由愛國之心而起，然張歸之於「外來之刺激」，頗有無奈且憤恨之感。張此言的社會背景正值袁氏帝制活動時期，所以「外來之刺激」即指袁氏帝制活動。可見，有進步思想的軍人學生，始終關注著社會動態，社會任何變化都心繫這些學生，兩者之間已顯然有潛在的互動聯繫。況且時下並非張一人有此感慨，「近來同學與外界通信頗有涉及政治情事」。<sup>24</sup>這就反映出，一方面軍人學生關切著國家的命運，對國家的前途有自我的認同，希望國家能夠按照自己認同的方向前進，自己可在身邊策報國心力；另一方面社會的動向反過來又制約著軍人學生，造成（「刺激」）他們因社會變化（往往與自我認同的方向差異懸殊）而作出不同的行為表現，這是由時代條件所決定的。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就容易理解時下青年奮進中帶著困惑與無奈的緣由了。

### 4 五四運動與軍人學生

五四運動是以社會大學生為主力軍的，軍校學生在相關文獻中的記載有限。五四運動中，保定軍校學生並沒有直接參與，這當然有軍校的特殊原因。但是，軍人學生對五四運動表現出了相當的熱情，五四運動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了軍校的學生之中。

在我們入伍當兵期間，1919年北京學生的「五四」運動對我們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們原來中學同學有不少在北京各大學上學，舊同學的關係一直很密切。每逢星期日，我們經常請假到北京與他們見面。當時《新青年》一類的新刊物，就是從他們那裏傳到我們手中，使我們也受到新思潮的影響，不過我們在軍隊中受到軍紀的約束，與社會隔離，對國事沒有各校學生那樣關切。「五四」運動中，愛國浪潮便及全國，我們從思想上也受到了震動，對段祺瑞政府的看法完全改變了。過去曾天真地把救國希望寄託在段氏政府上，經過「五四」運動，才認識到段和各省軍閥是一丘之貉，都是為個人野心爭權，不惜喪權辱國的人物。這使我們一度對國家前途和個人將來出路的幻想完全破滅，經過「五四」進步思潮的影響，認識到只有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新的希望。<sup>25</sup>

儘管其中的影響有很大的間接性特點，但顯然這種影響是存在的。五四運動後，有學生在軍校中從事研究社會政治學說，尤其信仰馬克思主義，後來其秘密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與40多位志同道合者發起成立進步社團，以羅致革命軍人，謀中國革命。<sup>26</sup>保定軍校的學

生有很多後來堅定地走向了革命救國的道路，軍校有共產黨員近10人。

## 5 社會黨派與軍人學生

民國初年的社會黨派繁多，最有影響力的黨派當屬國民黨與進步黨。兩黨派為擴充自己的勢力，紛紛拉攏保定軍校學生，尤其是進步黨，或以金錢收買，或誘以名利，極力爭取。當時在校的北方各省學生以為有利可圖，便加入了進步黨；而南方各省的學生，多受孫中山的影響，則加入國民黨；尚有一部分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派別。<sup>27</sup>這種明顯的黨派立場，受到了當局的廣泛注意，袁世凱、段祺瑞對南方學生密令嚴加管束。軍校並不允許學生參與政事，但進步黨依靠袁世凱拉攏軍人學生則無不可。實際上，學校條例中並沒有規定學生不准參加政黨的條文，不僅社會黨派涉足軍校，軍閥陸榮廷以及黎元洪都按時給本地學生經濟補助，<sup>28</sup>這表明保定軍校軍人學生並非幽閉於校園，獨立於社會之外，軍人學生與社會的聯繫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象，受到來自於社會因素的推動。

從軍人學生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思考：（1）這種互動關係反映了民國社會一定階段內的歷史走向，為我們認識這段歷史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2）這種互動關係不是特定階段歷史的全部內容，但它對特定階段的歷史產生的某種影響也不容忽視。

（3）軍人學生參與社會活動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學生個人的思想覺悟、民國初期的軍事教育等等。實際上，在保定軍校中，軍人學生有明顯的分化，可以分為「進步群」、「保守群」、「中立群」。這些不同群體的結合，背後所反映的即是個人的思想覺悟不同。「進步群」關心時政和國家前途，用心鑽研軍事，立志報國，表現對黑暗政治的不滿，有革命的精神；「保守群」則不思進取，無視民族國家的命運，貪圖享樂，安於現狀，往往立身於軍閥政府；而「中立群」不溫不火，既不敢批評時政，也不敢暢言革命，但求安身立命，或追隨軍閥，或參加革命，二者兼可。民國初期的軍事教育重在培養軍閥軍隊的初級軍官，穩定個人政權（當然對外則稱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民眾利益）。這種教育為政府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也養成了軍人的愛國報國心，這為日後他們參與不同的社會活動奠定了基礎。

## 四 餘論：保定軍校軍人學生的社會歸向

保定軍校的存在時限為1912年直到1924年，是為民國建立初期，這一時期的社會極不穩定，社會發展的主導方向未能確立。這段時間實質上一直處於軍人主導時期，政治領域內的具有象徵民國意義的國會、憲法和內閣無時不受到軍人的衝擊。這一時期的軍人學生群體在特定領域內影響著社會發展的趨向。軍校學生的出路基本有兩個方面：一是到各省軍閥處任職，大都畢業直接會本省，但也有去他省謀出路的，如湖南督軍譚延闓就招攬了眾多外省的畢業生<sup>29</sup>；一是南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無論是任職於軍閥，或是追隨孫中山走革命道路，這批軍人學生的歷史價值都得到了體現。此外，有一部分投身於軍事教育中，保定軍校的前期優秀畢業生有留校任各科教官，<sup>30</sup>也有一部分後來南下入黃埔軍校，成為教官。<sup>31</sup>保定軍校的軍人學生步入社會後，身為初級軍官，處於社會的底層，與社會的發展動態聯繫緊密。他們畢業後分配到全國各地陸軍軍隊中，「一般是受到歡迎的」。<sup>32</sup>這一群體帶著時代的特徵，逐漸凝聚為社會變遷的動力因素，他們與民國初期的歷史事件相融合，並且延伸到後來社會演進過程中，如「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可以說貫穿整個民國史，作為民國社會演變的動力，體現了出來。軍人學生在社會「權勢轉移」的過程中，通過

師生、同學等關係相互引導，不斷發生自我的變化和群體的構建，他們是從社會的邊緣逐步上升到社會的重心領域，從屬於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共性。在社會變遷的格局中產生新的聚集方式，使得軍人學生與社會發生的聯繫不斷裂，從而決定了軍人學生群的社會歸向。

#### 註釋

- 1 鄭志廷、張秋山等編著：《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95-97。
- 2 轉引自《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15。
- 3 姜廷玉：保定軍校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載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選編：《中國近代軍事史論文集》（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頁291。
- 4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16-17。
- 5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52。
- 6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54。
- 7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64。
- 8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154。
- 9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四冊，轉引自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保定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頁14。
- 10 《保定陸軍學堂暨軍官學校史略》，頁160。
- 11 人數根據《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同學錄》統計，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229-533。但由於該同學錄不完整，實際人數超出330人。
- 12 姜廷玉：保定軍校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頁287。
- 13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123。
- 14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148。
- 15 彭明，周天度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篇，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571。
- 16 文聞編：《舊中國軍事院校密檔》（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頁47。
- 17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53。
- 18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230。
- 19 《中華民國史》，第二篇，第二卷，頁312。
- 20 姜廷玉：保定軍校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頁292。
- 21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241。
- 22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155。
- 23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79。此語出自張治中1915年11月的保定軍校生活日記。
- 24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54。
- 25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142。
- 26 姜廷玉：保定軍校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頁293。
- 27 《舊中國軍事院校密檔》，頁36。
- 28 《舊中國軍事院校密檔》，頁32。

- 29 《舊中國軍事院校密檔》，頁48。
- 30 可參見《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同學錄 職員錄》，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頁232-243。
- 31 《保定陸軍軍官軍校》，頁127-128。
- 32 《舊中國軍事院校密檔》，頁33。

馮 超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七 期 2008年1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七 期（2008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